



石刻上4.3万余字铭文，记录宋代巴蜀人的春耕秋收和柴米油盐

800多年前的市井人生 藏在大足石刻崖壁上



8月25日，大足石刻与宋史研究学术研讨会在重庆大足闭幕。50余位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大足石刻与宋代社会、文化、艺术等议题展开了深入交流，进一步拓展了大足石刻作为世界文化遗产的学术研究维度，推动石窟考古与宋史研究深度融合。

大足石刻映照出了怎样的宋代历史？密密麻麻的宋代铭文，无疑是800多年前的宋代巴蜀先民留给我们的答案。它们如同一部刻在崖壁上的“巴蜀梦华录”，记录下了宋代巴山蜀水间普通人的春耕秋收、柴米油盐。

大足学研究中心副主任、研究馆员李小强介绍，据《大足石刻铭文录》统计，散落在大足石刻造像之间的宋代铭文达449件、4.3万余字。“如果说孟元老的《东京梦华录》是一幅都城市井的文字长卷，那么大足的宋代铭文便是一部留存在崖壁间的川东社会笔记——它没有统一的篇章结构，却因每一则题记都来自真实的生活现场，而具有鲜活、质朴的特点。”

1 阡陌之间的农耕实录

说起大足宝顶山石刻中的《牧牛图》造像，游客们都不陌生。但许多人都没留意到，它旁边就有宋代人给子孙留下的偈语——“春犁夏耘”。李小强说，这句偈语用短短4字道出了当地水田稻作的重要地位。

宋代巴蜀大地上的农业图景只有水稻吗？李小强在铭文中找到了答案——北山、石篆山等处的题记中，“麦谷”“麦粟”频繁出现；南山宋代诗刻更是留下“极目稻塍平浩渺，一川麦陇翠蒙茸”的句子。这证实了，当地在宋代时便已经形成稻麦并行的农业结构。

宋人骄傲的还不只是“大丰”景象，石篆山北宋元丰年间刻下的《严逊记》碑，还出现了“复合经营”的模式。

这块碑刻完整记录了一位名叫严逊的乡绅是如何经营庄园的：他特意在造像区域种植松柏和果木——既种经济林，又营粮食种植。这说明那时复合经营模式已在巴蜀乡间生根发芽。

碑文中还有一句耐人寻味的告诫：“警人损动诸尊像及折伐龕塔前后松柏栽培记。”李小强说，这充分证明严逊不仅规划了土地如何种、钱粮如何用，还操心着林木如何维护，一个既务实又细心的宋代乡绅形象跃然石上。

民间物产流通的情况同样被铭文真实记录下来：北山、多宝塔、

石篆山现存数百条供养人题记，完整记录了宋代巴蜀地区民间流通的各类物产。

经济作物中被频繁提及的是桐子、桐油，这与宋代川东桐树普遍栽植直接相关。手工原料中关于铁料的记载也非常多，佐证当时冶铁、铁器加工行业发展成熟。李小强说，在大足宋代石刻中，菜刀、剪刀、斧、秤等铁制器物图像屡见不鲜，与铭文所载铁料捐赠相互印证，足见当时铁制器具已广泛应用于民众的生产和生活。

2 市井之中的金融实践

如果说农业实录展示的是宋代巴蜀地区的“基本面”，那么石刻中关于货币流通和工程财务的记载，则透露了更丰富的信息——这座偏远的川东县城，居然有着多元的金融实践。

南宋时期，朝廷在四川推行“钱引”。北山和宝顶山的南宋造像铭文中，大量出现以“钱引”捐资的案例。而北宋流通的“交子”也被雕刻进了造像中。在宝顶山大佛湾第15号龕造像中，考古人员发现了整齐堆放的“交子”石刻造像——这是世界范围内首次在石窟造像中发现宋代纸币图像，堪称中国货币史的珍贵实物。

在宋代，不同职业的人们都爱用哪些货币呢？大足石刻中的题记显示，普通商贩多用“钱引”“交子”出资，乡绅富户则捐铜钱。这说明大足在南宋时已形成多元货币并行的商贸格局。

更令人称奇的是民间的财务管理机构。北山多宝塔由南宋绍兴年间民间集资修建，塔壁铭文中反复出现“塔库”一词，这是一个专业的财务管理机构。

铭文记载，“塔库”有专班专人管理、分工合作，他们既统筹全部捐资钱粮，又负责接收各类捐赠，所有账目统一刻写于塔壁公示，每一层塔身都留有阶段性捐资清单——开凿多宝塔收了多少米、用了多少工、花了多少钱，一目了然。李小强说，这种财务公开透明的做法，即便放在今天也毫不逊色。

大足“塔库”制度的完备程度，堪称宋代巴蜀民间管理钱财的典范，也是《东京梦华录》中未曾记载的市井智慧。

3 崖壁上的宋代“餐桌”

“钱引”“塔库”记录了宋代大足人如何管钱，而下面这些铭文则告诉我们，他们赚钱之后，吃什么、喝什么。

800多年前，一个叫吕元锡的士人带着弟弟多次登上北山避暑，他在第176号龕外侧留下一行题记：“数来此避暑，煮饼、瀹(yuè)茶、弈棋、赋诗。”

“煮饼”是什么？烤饼能泡汤吗？在宋代，“饼”是所有面食的统称——汤饼近似后世的面条，蒸饼就是馒头，胡饼则类似烧饼。“北山条件简陋，吕元锡兄弟煮的大概率是汤饼，沸水下面，热腾腾一碗，山间野餐足矣。”李小强分析说。



▲宝顶山大佛湾十五号龕造像的纸币“交子”(红圈处)石刻造像



《严逊记》碑中记载了复合经营理念

石刻造像也为饼食的普及提供了图像证据。宝顶山《父母恩重经变造像》中，呈现了母亲手持圆饼喂食孩童的画面；另一龕造像《担父母行乞图》中，行乞者随身携饼，路人施予的同样是圆饼——可见圆饼是宋代大足的寻常食物，并非富裕人家才吃得起的稀罕物。

当然，宋代大足的餐桌上不只有面食，石刻中偶尔也能见到人们饮酒的痕迹。重阳节题记提及“茱萸酒”，与《东京梦华录》所载汴京重阳饮菊花酒、佩茱萸之俗如出一辙。这说明，中原的节令饮食习俗，在南宋时期已深入巴蜀民间。

细读这些关于“吃”的文字可以发现：石刻中的饮食记录几乎都与特定场景绑定：避暑时煮饼喝茶，重阳时饮茱萸酒，母亲喂食孩童的画面刻在报恩经变中。这正是《东京梦华录》式的书写逻辑——饮食即生活，生活即文化。

从稻麦并行的田野到运转有序的“塔库”，从一碗山间煮饼到一杯重阳茱萸酒，这部石头上的“巴蜀梦华录”记录了宋代普通百姓最真实的日子——他们的耕种、他们的饮食和他们的一年四季。

正如与会学者所言，大足石刻“是一座艺术宝库，又是一座史料宝库”，当我们的目光穿过层层凿痕，那个遥远而鲜活的宋代，便从石头里走了出来。

新重庆·重庆日报记者 李晟

宝顶山《父母恩重经变造像》中，母亲手持圆饼喂食孩童。